

李刚兴 编著



两宋大儒 评介

两宋时期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过程中又一个异彩纷呈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哲学、文学和史学等方面，

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特别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理学的兴起。

以理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潮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干，

并吸取了佛道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

而铸造出来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之需要而产生的新儒学，

其代表人物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

从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上讲，在唯心主义理学产生发展的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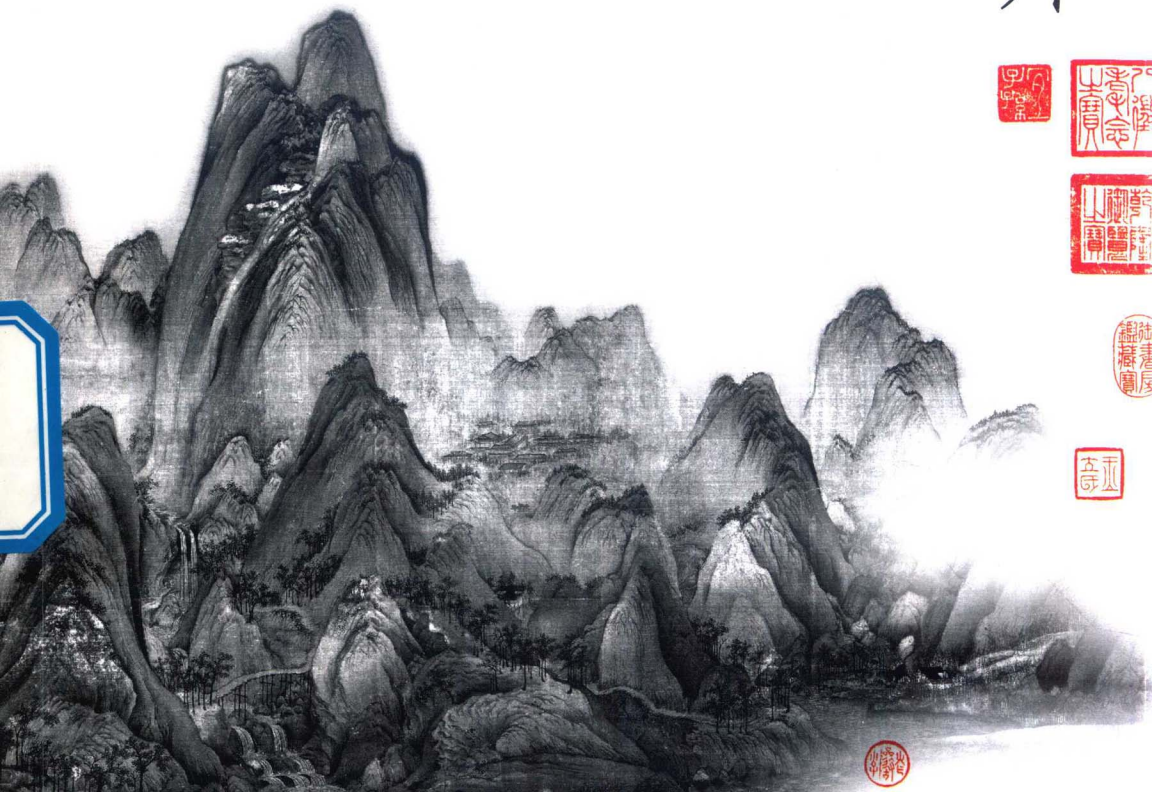
也产生了与之相对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其代表人物则有张载、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人。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李刚兴 编著

两宋大儒 评介

两宋时期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过程中又一个异彩纷呈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哲学、文学和史学等方面，
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特别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理学的兴起。

以理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潮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干，
并吸取了佛道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

而铸造出来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之需要而产生的新儒学，
其代表人物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

从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上讲，在唯心主义理学产生发展的同时，
也产生了与之相对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其代表人物则有张载、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人。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宋大儒评介/李刚兴编著.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504-3443-1

I. ①两… II. ①李… III. ①儒学—研究—中国—两宋时代

IV. ①B24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3135 号

两宋大儒评介

李刚兴 编著

责任编辑:廖韧

助理编辑:张春韵

封面设计:穆志坚

责任印制:朱曼丽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bookej.com
电子邮件	booke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3.75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4-3443-1
定 价	82.00 元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前言



两宋时期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异彩纷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哲学、文学和史学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理学的兴起。以理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潮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干，并吸取了佛道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而铸造出来的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之需要而产生的新儒学。其代表人物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从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上讲，唯心主义理学产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与之相对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其代表人物则有张载、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人。在史学方面，有以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学巨著，这是我国史学达到又一新高峰之标志。在文学方面，两宋时期更是大放异彩的时期。

作为两宋儒学之主流的理学，即所谓“义理之学”。何谓“义理之学”？其开创者之一的张载说：“经之大体，在义，不在文，文则有理，是为义理。”（《经学理窟·义理》）由此可知，研究儒家经典中的义理之学，就是理学。这种研究方法，一改过去拘泥于对经典内容进行咬文嚼字的训诂的做法，突破旧习，侧重于对儒学经典中义理之阐述和发挥。经过他们的勤苦探索，儒家学术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形态，这就进一步推进了儒家学说的哲理化，从而弥补了儒家之缺陷，将我国古典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从朴素



唯物论、朴素辩证法，还是主客观唯心论的思辨方法上看，他们都在理论思维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他们论证的目标都是证明封建制度的合理性，但其在探讨天人关系等方面也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见解，特别是儒学阵营中那些坚持唯物论的思想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宋代理学在儒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算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次思想突破。虽然其内部有不同学派和不同学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地体现了又一次思想开放。

正因为宋代的儒家研究突破了只对儒学经典的内容进行繁琐的考释、注疏的旧习，其思路较为开放，视野较为开阔，从而体现出一种新的学术风气。由于他们充分地发挥了探赜索隐的治学精神，又能各抒己见，这就大大地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氛围，从而推动了学术进步。

本书所介绍的 15 位宋代名儒，虽然同属儒学阵营，但在当时比较开放和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中能够充分发表各家的见解，因而也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出现了又一次百家争鸣。特别是在哲学的路线斗争中，经过两种不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争论，其理论思维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思想家们在道与器和理与气的关系上、义利关系上、人性善恶关系上、理欲关系上的争论非常激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争论，都在理论思维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很多有益而深

刻的启迪。在这里，还要着重指出，本书所介绍的 15 位名儒，也是当时杰出的教育家，其中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人，都算得上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卓越的教育家。他们聚徒讲学，主管书院多年，培养了大量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使之传递不息、代代不绝的优秀人才，其功绩不可磨灭。他们的教育思想值得借鉴。

笔者编著此书之用意，在于将两宋著名儒家学者之学术思想和生平行事向读者做概略介绍。这样，也许能让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不用在两宋的浩瀚文献中多费时间，就可以对这个时期的主流文化思想进行概略的了解，同时也希望对正在学习和从事这方面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在写作中，参考和采纳了当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特致谢意！由于本人学力有限，书中之论述若有舛误和不当之处，诚盼读者批评指正。

李刚兴

2016 年写于西华师范大学

目 录



安乐先生	邵 雍	1
理学鼻祖	周敦颐	13
史林宗匠	司马光	28
关学宗师	张 载	45
宋学泰斗	程 颢 · 程 颐	63
五峰先生	胡 宏	79
理学大师	朱 熹	91
湖湘学宗	张 栻	114
婺学之祖	吕祖谦	128
心学祖师	陆九渊	142
龙川诤儒	陈 亮	155
水心先生	叶 适	170
鹤山耆儒	魏了翁	186
西山先生	真德秀	201



邵雍是北宋五子之一，他同周敦颐、张载、二程都是两宋理学的创始人。他建立的象数学体系，企图用一个完整的图式来说明宇宙演化和社会、人生的全部运动程序。这个象数体系虽是由主观推演而成，但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成分。邵雍是第一个把象数学理论和方法同理学思想相结合的理学大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很高、影响很大。

一、青年刻苦自励，隐逸不涉仕途

邵雍字尧夫，又自称安乐先生，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谥康节。其先世为河北范阳人，曾祖邵令以军职随从宋太祖部下，后来移居衡漳（今河北省南部），他青年时随邵古再迁家于共城（今河南辉县），最后才移至洛阳定居。邵雍在幼年时期，其家境并不富裕，他的曾祖父做过小官，祖父和父亲都是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在其跟随父亲从衡漳迁去共城时，“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养父之余，刻苦自励者有年”（《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上》）。尽管如此，青少年时期的邵雍却能“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艰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宋史·道学一》本传）因此在当时就获誉为“好学”青年。他不但能刻苦钻研书本知识，而且亲自出门游学，了解社会实际，曾逾河、汾，涉淮、汉，周游了齐、鲁、宋、郑之墟。经过一段时间，他幡然省悟道：“道在是矣！”便决定定居于洛阳，不再外出。



由于邵雍享有“好学”的美誉，受到了共城县李之才的赏识，并亲自去邵家访问。李之才问：“你了解物理性命之学吗？”邵雍答：“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教诲。”于是“乃师事之才，从其学”。李之才看中了邵雍的才气，随后又将《河图》《洛书》和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图像传授给他。邵雍的象数学，从渊源上讲，同道教有很深的联系。朱震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宋史·儒林五·朱震传》）他指出《先天图》传自著名道士陈抟。后来，邵雍著《皇极经世书》，推衍宇宙变化，其思想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于道教典籍。关于《皇极经世书》的思想来源，徐必达在《邵子全书》的附录中说：“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闻道于汶阳穆修伯长，伯长以上虽有其传，未之详也。”根据朱震所述，穆修以上是种放，种放以上就是陈抟了。

邵雍所学与李之才的传授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够“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并且能够广览博取，吸收别家之所成，故其成就多属自创。

邵雍虽然博学多才，“通五经义奥，知古今之变，尤精《易》理”，但终身没有做官。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做官的机会，而是他自己不愿做官，他学成之后，一直在洛阳过着隐居生活。初到洛阳时，生活十分清寒，其家“蓬蒿环堵，不庇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宋史·道学传》）。那时，王安石当政，朝中一批地位和名望很高的旧党大臣，如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退居洛阳，这些人知道邵雍是一位贤者，对其十分尊敬，并与之结交。嘉佑年间（公元1056—1063年），朝廷下诏寻求隐士，当时的洛阳留守王拱辰积极推荐了邵雍，因被授为将作监主簿，接着又举进士，补颍州团练推官。对这些官职，他都不愿接受，后因固辞，不允，才勉强受命。可是他竟“称疾”，不去上任。邵雍有诗，写道：“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断送落花安用雨，装添旧物岂须春……”（引自《宋元学案·百源学案》），说明他不愿意涉足政事，以免自寻烦恼，只求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实际上，邵雍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由于他在学术上很有成就，

其先天象数学自能独具一格，加之他在上流社会中表现出高雅风度，深为当时的儒者和文士们所推崇，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后来，司马光等 20 多人为他筹措了一些钱，买了官地园宅让他居住。其住宅契寄司马光名下，园囿契寄富弼名下，田庄契寄王郎中户名，在上述诸人的庇护之下，邵雍就免去了应交官府的赋税。当时，他与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祖无择等一些旧党大官僚结为至友，相互往来甚密，常以诗酒唱和。因此，邵雍名为隐士，实际上却是一位地位很高的社会名流。

邵雍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有《皇极经世书》和诗集《伊川击壤集》，一共近百万字。明代徐必达编有《渔樵问对》《无名公传》（即《邵雍传》）和《洛阳怀古赋》等。

二、眼底海阔天空，胸中“春晴日午”

这两句话，是清乾隆时期，学者王植在《皇极经世全书解》中对邵雍的评语。结合前人所记述的其他有关史料来看，这一评价对邵雍是比较合适的。程颐在《邵雍节先生墓志铭》中说：“（邵雍）德气粹然，望之可知其贤。不事表襮，不设防畛，正而不谅，通而不污，清明洞彻中外……群居燕饮，笑语终日，不取甚于人。”（《明道文集》卷 4）这是说，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贤者，为人正派，同人交往有其原则，同而不污。他的头脑清醒，能洞察明暗，同时又是一个十分乐观的人。《墓志铭》还说他为人豁达、开朗，“接人无贵贱”，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宋史·道学传》称赞邵雍与人交谈时不讲他人的坏处，喜欢称道别人的长处，有人向其请教，则有问必答，从不盛气凌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因此博得人们的好感，正派人士喜欢他的美德，不正派的人也能服其教化。人们认为，他的为人对洛阳一带的士风有着良好影响。

史书和墓志铭对邵雍不免有溢美之词，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确实具有很多优良品德。

邵雍初到洛阳时，家境十分清寒，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仍然自



得其乐。只是因为他后来结交了一批达官贵人，受其资助，生活才变得优裕起来。但司马光等 20 余人替他购置的园宅，规模并不很大，他“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宋史·道学传》）。当然，既称“安乐窝”，可能收入不止“仅给衣食”，至少是比较优裕。不过，这只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邵雍的晚年，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觉得十分满足，如他在《击壤集》的《后园即事》中说：“太平身老复何忧，景爱家园寓在游，几树绿杨阴作合，数声幽鸟语方休。竹侵旧径高低迸，水满春渠左右流，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因此，他将自己的园宅称为“安乐窝”，又自号“安乐先生”。这说明他不但不以做官为荣，而且有不谋取功利的态度。

这位安乐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闲自在，“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宋史·道学传》），别有一番情趣。春秋时节，出游城中，风雨时不出门，出游时乘一小车，由一人牵拉，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行无定向，无拘无泥。由于他在洛阳结交了很多文人儒士、官僚学者，并在这些人之中享有声誉，受到“雅敬”，当他乘坐的小车出现，“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无论童孺家仆，都欢喜地说：“吾家先生至也。”又据《宋人轶事》，邵雍每当“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王公家，其来，各置安乐窝一所，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咸迓于门，争前问劳，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饜飫数日。复游一家，月余乃归”。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缘很好。据说当时有十余家人为他准备了像“安乐窝”一样的住所，随时等待他的到来，名曰“行窝”。邵雍去世后，有人写挽词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自此以后，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十分逗人喜爱的客人，他们对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从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乐观、随和、与世无争、不求荣利、安时处顺的人。但若从更深层的情况来看他对世事人生的态度，却又另有情由。作为一个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对历史、社会、人生乃至

宇宙万物都有更深刻的观察与思考。他对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复杂性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因此，他对自己应该怎样立身处世，自有一套人生态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与世无争，能够安时处顺，自寻乐趣，是因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了许多阴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保全自己的处世哲学。关于这一层，可从《击壤集》的诗篇中看明白。如《安乐窝中吟》组诗中的第一首云：“安乐窝中职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安乐窝中万户侯，良辰美景忍虚留。”他的职责就是在安乐窝中写作《皇极经世书》，并且看花、饮酒、赋诗，此外一切，皆无兴趣。

自号“安乐先生”的邵雍，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乐和狂放不羁，而是适可而止，很有节制。在饮食方面，只是每日晡时（申时）饮酒三四瓯，微醺即止。他说：“酌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又有诗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饮酒莫教成酩酊，赏花慎勿至离披”（《安乐窝中吟》第十一首）。朱熹对此有看法，说：“康节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离披’是也。”有学生问朱熹：“如此则与张子房之学相近。”朱熹说：“固是，康节固有三诗称赞子房。”这说明邵雍只是求乐，而不是享乐主义者，只是对人生持有达观态度，故而能够自得其乐。他还有诗写道“美誉既多须有患，清欢虽剩且无忧”，这也说明他为什么不重名位，且能够“清虚自守”。邵雍的处世态度的确受张良之影响，难怪朱熹说他“有个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语类》卷100）。邵雍曾在《张子房吟》中称赞张良是一个“善始又善终”的人，这就是一证。由于他虽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又善于同一些上层人物融洽相处，当时的著名大臣有诗说：“先生不是闭关人，高趣逍遥混世尘”（《邵子全书》卷20）。这无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尘”的处世态度。

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虽然他同旧党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并且也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但不应该把邵雍同旧党官僚相提并论。邵雍为人宽厚，遇事不走极端。如他病重时，敌视新法的程颐去看望他，问道：“从此永诀，更有见告乎？”邵雍“举两手”示意说：“前面路

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乎？”（《宋元学案·涑水学案》）又如，当旧党领袖司马光在邵雍面前称旧党骨干人物傅尧俞“清、直、勇三德，人所难兼”，邵雍却不以为然，说：“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是为难耳。”（《宋元学案·涑水学案》）在他看来，仅有清、直、勇三德并不难，能具有“不耀、不激、能温”三德才是不容易的。这个事实说明，邵雍并不赞成旧党的过激行为。这就是他对新旧两党在政治斗争中的态度。过去一些论者把邵雍等同于一般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这是不公平的。

三、先天象数之学，巧绘宇宙图式

象数之学盛行于汉代，当时的易学家曾运用《周易》的数字模式去解释天地宇宙之构造及其演化现象。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王弼首创用“义理”解《易》的方法，此后象数之学渐不为学者所重视。后来，汉代的象数图籍也只有纬书《周易乾凿度》被保留下来，象数之学只在民间以神仙方术的形式进行传播。另外，还有一些隐士在继续研究，用秘密的方式流传下来。到了五代末年和北宋初年，有道士陈抟以象数解《易》，后又以《先天图》的形式传至种放，又四传至邵雍。然而，陈抟的象数学不同于汉儒之象数学，他的象数学即所谓“先天学”。因为宋儒称伏羲之“易”为“先天”，称文王之“易”为“后天”，研究伏羲之“易”之学谓之“先天学”。所谓先天象数学，就是用象数推演方法去解释《周易》关于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学说。象数学派是哲学史上出现的一个独特的哲学流派。

邵雍的先天象数学，主要包含在他的《皇极经世书》中。《皇极经世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体系也很庞大。在这本书中，他力图构造一个说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完整体系，并力求寻找出一个贯穿于整个体系的最高法则。邵雍的学说虽然上有承传，但《皇极经世书》基本上是用自己创造的象数体系来概括宇宙之间的一切，主要是由他“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朱史·道学传·邵雍传》）。

下面来介绍邵雍的宇宙万物演化图式。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所建构的宇宙图式是从象学推演出来的，邵雍的宇宙图式则是兼用象学和数学推演出来的，所以邵雍的图式较周敦颐的图式更为详细。

关于宇宙的本原问题，邵雍认为天地万物是由一个总体的“道”产生出来的。他说：

道生一，一为太极；一生二，二为两仪；二生四，四为四象；四生八，八为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后天地之数备焉。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原，于一而演之以万，穷天下之数而复归于一。

（《皇极经世》卷上）

这里所说的一、二、四、八、六十四就是“数”，与数相对应者是“象”，即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具体地说，作为宇宙本原的“道”演化为天地万物的过程，就是指道生天地。即“天为阴阳，地分刚柔，刚柔则二分为四。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此天地之道；动之始阳生，静之始阴生，此天地之用，刚柔为天地之用。天生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即日、月、星、辰；地生出太柔、少柔、太刚、少刚，即水、火、土、石”（《皇极经世》卷上）。此处所讲的太阳、太阴、少阳，少阴，是为天之四象，它们各自代表的具体物质就是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皇极经世》又说：

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春、夏、秋、冬）成焉；刚柔尽而四维（东、西、南、北）成焉。夫四时四维者，天地至大之谓也。

（《观物内篇》之一）

“四时”指时间形式，“四维”指空间形式。“四时”“四维”是标志整个宇宙的总概念。这里顺便指出，既然断言至大的天地以阴阳和刚柔尽其作用，又表现为“四时”“四维”的宇宙形式，毫无疑问，这个宇宙就是物质性的宇宙。这可以看出，邵雍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

前面所讲的地之四象为水、火、土、石，也就是说，《皇极经世》是把水、火、土、石作为构成地的基本元素，而不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基本元素，这是为什么？有人认为，邵雍以日、月、星、辰为天之四象，以水、火、土、石为地之四体，这是讲的天地之物象，而金、木、水、火、土谓之五行，四象、四体乃先天所具有，五行为后天所生。后天是先天所生，五行乃水、火、土、石所生。水、火、土、石才是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因为金、木、水、火、土都包含于水、火、土、石之中。这是因为，“金出于石而木生于土，有石而后有金，有土而后有木”。

有了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之后，天地之体就形成了。有了天地之体，然后再经过变化，就生成了天地万物。这个变化的顺序如下：

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寒暑昼夜交而天地之变尽之矣。水为雨（水气所化），火为风（火气所化），土为露（土气所化），石为雷（石气所化），雨、风、露、雷交而地之化尽矣。

（《观物内篇》）

接着又说：

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矣。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矣。

（《观物内篇》）

这就是说，有了天地之体，产生了昼夜寒暑，然后有雨、风、露、雷，又有了寒暑昼夜，之后产生动物、植物。经过上述变化，宇宙万物就产生出来了。

说到这里，要弄清一个问题，就是邵雍所讲的产生万物的“道”或“太极”的属性问题。“道”（太极）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认为，邵雍之作为宇宙本原的“道”“太极”“气”都是同等程度的范畴。他说：

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地观物，则万物

为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道之道尽之于天地矣；天之道尽之于地矣；天地之道尽之于物矣；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矣。

（《观物内篇》之三）

作为天地之体的“道”，可以从天地万物与它的相互关系中看出其物质属性。前面讲过，天地为阴阳二气所变，表现为“四时”“四维”的时间、空间形式，是物质性的。所以说，“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道之道尽于天，天之道尽于地，天地之道尽于物，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十分明显，这里的“道”不是精神实体，而是与天地万物相统一的物质范畴。

在另外一处，邵雍说出了天地之本是气，认为天地为一气所生。他说：

本，一气也。生则为阳，消则为阴，故二者一而已矣。

天，以气为主，体为次。地，以体为主，气为次。

（《观物外篇》上）

既然本为一气，就是认为宇宙的根本是气。气表现为阴和阳，阴阳是二合一的（统一于气），那么，太极生阴阳、同气分阴阳这两种说法就是一回事了。“天以气为主，体为次，地以体为主，气为次”的意思是，天体是以气为主，其实体为次的物质（因为有形体的日、月、星、辰，仅仅是无限的天体中的次要形式），地主要是由气凝聚而成的有形实体，其中的气态物质是次要的东西。总而言之，这就是庄周说的“通天地一气耳”。在邵雍看来，天和地的分别，只在于气的聚散不同。如此看来，邵雍讲的“道生天地”或“太极生两仪”，实际上都是说的“气生天地”。因此，我们认为，邵雍所说的“道”“气”“太极”，都是同等意义的范畴。

对上述说法，还可以从邵伯温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

夫太极者，在天地之先而不为先，在天地之后而不为后，终天地而未尝终，始天地而未尝始，与天地万物圆融和会而未尝有先后始终也。有太极，则两仪、四象、八卦以至于天地万物固已备矣。非谓今日有太极而明日方有两仪，后日乃

有四象八卦也。虽谓之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实一时具足……是故知太极者，有物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后来尝污损，自古及今，无时不成，无时不在。

（《宋元学策》卷10）

邵伯温是邵雍之子，象数学的正宗继承人，对其父的学说最了解，也是最忠实的继承者，并对邵雍的著作有所发挥。在前面引文中，将太极看作是与宇宙万物同时存在、不可分离的东西。因为在天地产生之前，整个宇宙是个混沌未分的物质存在，它与天地万物圆融而不可分别。只有在它分化之后，才有了万物之别。然而，这时的天地万物仍然统一于太极，并且各具太极之性。“太极”与天地万物之别，只在于“太极”是根本、总体，并具有超时空的永恒性和绝对性，而天地万物则不具备这种特性。由此看来，产生天地万物的“太极”只能是物质性的，不能说它是绝对精神之类的东西了。

最后，邵雍讲到了人。他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下》）天、地、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和动植物产生之后，当然也产生了人。人是什么？邵雍认为，人也是万物之一，但他们是宇宙发展的最高级产物。他说：“人亦物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观物内篇》）又说：“万物之道尽于天矣，天之道尽于地矣，天地之道尽于物矣，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矣。”（《观物内篇》）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在于人有灵于万物之感官，能收万物之声色气味，更重要的是人有思维，能通万物之情。他还指出，“万物都受性于天，但恒又各有其性。在禽兽，则为禽兽之性；在草木，则有草木之性”（《观物外篇上》）。这就指出了物质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并指出了人高于万物的原因。

以上的观点，基本上是合理的。然而，当邵雍讲到人的社会性时，即便从唯物主义转为唯心论。他说：“天有阴阳，人有正邪；正邪之由，系于上（君）之好也。”（《观物内篇》）这就是说，人的正邪是由君上之爱好来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天之阴阳来决定的。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此外，邵雍又把入分为普通人和圣人，圣人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